

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

常振威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

常振威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/常振威 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6.12

ISBN 7-5034-1822-2

I. 一… II. 常… III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H13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68527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:	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
作 者:	常振威
责任编辑:	李春华
封面设计:	高 峰
印 刷:	北京图文印刷厂
装 订:	北京图文印刷厂
经 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:	850×1168 1/32
字 数:	360千字
印 张:	15印张
版 次:	2007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:	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	26.00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你们：

曾与之一一起亲历过那场劫难的纪友武、金定槐、唐文福、鄢来云、王遵猷、彭善池，还有黄清川，特别是张文！我少年时代的同学们。

题 记

——什么人有权写作自己的回忆录？

——每个人都有。

因为没有一个人不应该读这种回忆录。

为了写作自己的回忆，完全不需要他是个伟人，是个出名的恶棍，是个有名的演员，是个国家要人——要这做，只要是个平常的人就已经足够了，只要他有什么东西可以讲，只要他不但有需要，而且多少还有叙述的本领。

[俄] 赫尔岑 《往事与沉思》



序记忆力的复苏与历史的再发现

大 荣

培根说：“读史可以使人明智。”这句话自然是不错的，不过弄得不好，也会有陷阱。比如读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就不行。如果把这一类的“史”读多了，又无力分辨真伪，满脑壳里装的大概是浆糊，即使有“智”，也不可能“明”起来了。

1929年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傖先生说：“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。”（转引自《胡适选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P246）从他的职业去判断，他说这句话应该是有所指的，也就是说，是他读了某些史书之后得出的结论。我虽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史书，但以此为鉴，也就明白读史同在当下购物一样，务必谨防假冒。

鲁迅对读史是很讲究的。他一向的主张是于正史之外多读野史笔记。以下便是从明代冯梦龙所著《笑林》里抄出的一则故事：

一人偶于露水桌上，以指戏画“我要做皇帝”五字。仇家见之，即掬桌赴府，首彼“谋反”。值官府未出，日光中露水已灭迹矣。众问：“汝掬桌至此何为？”答曰：“我有桌子一堂，特把这张来看样，不知老爷要买否？”

毋须反驳，部长先生的那句话便成了泡沫。在这个“黄金世界”里，一句玩笑话是可以治罪的，而且是“十恶”之首的“谋反”。如果不是太阳晒干了露水，这位戏画“我要做皇帝”的老兄，则非人头落地不可。

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冯梦龙的创作，用以论史，有失牵强。不幸得很，在正史里也能找到类似的记载。宋人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七有《五代滥刑》一则：

天成三年，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：有百姓二人，以竹竿习战斗之事。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，敬瑭杀之。次日枢密使安童海敷奏，方知悉是幼童为戏。

洪迈注明：“此事见旧五代史”。此记载可翻译成一句白话：“公元928年，有两个拿竹竿逗打游戏的儿童，因被认定为操练军事（企图谋反）而

被立即斩首。”

以上是笔记与正史相参证。其结果是在一瞬间颠覆了宣传部长的“黄金世界”。并使我们理由将宣传部长的高论更改为：“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以权力(皇权)为中心的世界。”在这个世界中，从扛桌子告发仇人的平民到皇帝左右操生杀大权的重臣，虽然地位悬殊，出发点不同(一为报复，一为尽忠)，其思想基础是完全一样的。无外乎是：维护皇上的权威，防患于未然，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。于是扛桌子的平民无事生非，小题大做，上纲上线；于是操持大权的重臣不问青红皂白，从重从快，一杀了之。

这就是细节的力量。

很多历史的真相消失了，其实就是细节的被遗忘。档案尚待解禁，内幕尚待揭秘，而大量的细节却深藏于民间，深藏在每一个亲历者的记忆里。巴金老人倡建的“文革博物馆”至今杳若黄鹤，这更是对每一个亲历者记忆力的考验。

常振威先生(1941——)自幼深为历次运动所害，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受害人。这使他的记忆构成了一座历史细节的宝库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随着某些档案、内幕因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而消亡，民间记忆里的历史细节就更加弥足珍贵。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，促使他一度冷藏的记忆力渐渐复苏，于是付诸文字，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言的回忆录——《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》(以下简称《少年犯》)。其中的甘苦，自不待言。

伏尔泰说：“所有时代因人心邪恶而彼此相似。”(《路易十四时代》)

马克思说：“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”(《法兰西内战》)

当《少年犯》拉开序幕的时候，决定少年常振威一生命运的两个细节，居然与我上引的两段史料相差无几。其中有时间可征的那一段是“天成三年”，与少年常振威入狱的时间1958年，相距是一千又三十年！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。为什么如此漫长的时间不能消弭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呢？生物学因考察物种遗传的原因而发现基因，历史学是否也有它的“基因”呢？毛泽东说过：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……我们不应割断历史。”(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)发展不是摇身一变，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类似“基因”之类的东西是肯定存在的。由于历史学是科学与非科学参半的一门学问，对其“基因”的搜寻是相当困难的。

话又要回到细节上。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,若干不同细节的有机组合,必将决定某一时段历史的面貌。

这里,我在先睹为快之余,活学活用,立竿见影,于不经意中发现了《少年犯》对于当下的三大贡献:

一、对研究“庐山会议”的贡献。

目前,研究“庐山会议(1959)”的著作有多种,其中以李锐的《庐山会议实录》最为著名最为权威。即以该书而论,囿于预定的叙述范围,它只写了“山上”,而只字不提“山下”。《少年犯》正好弥补了它的不足。在《少年犯》中,“山下”的“反右倾”要比“山上”的“反右倾”整整领先一年!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样两个“反革命(反党)集团”相提并论。这就是1958年在“山下”抓捕的以少年常振威为首的“反革命集团”;1959年在“山上”由毛泽东亲自命名定性的以元帅彭德怀为首的“军事俱乐部”。看似风马牛,却有一个共同点把二者连接在一起。因为两案的起因都是在于对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评价。

1958年是毛泽东所说的“人多议论多,热气高,干劲大”的一年。人是很的,议论并不多,经过1957年的那场“这是为什么”之后,真正实现了他所说的“我们就是要舆论一律”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《人民日报》上才长出了一颗重达500斤的白菜,稻谷和小麦的亩产更是节节攀升,达到十二万斤!尽管很多人对这些数据的真伪心知肚明,却一个个始终心照不宣。少年纪友武当时只是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,却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质疑。学校团委和教务处的第一反应是召开所谓的“大是大非辩论会”——这一项“知识产权”属于上一年的“反右”。辩论是不存在的,有的只是揭发和批判,在教务处副主任关某某的鼓捣之下,终于“挖”出了一个以少年常振威为首的“反革命集团”。

据《庐山会议实录》记载,刚上山时是准备开所谓“神仙会”的。在出现了彭德怀的《意见书》之后,由于毛泽东的强烈反应,才转而批彭、挖“军事俱乐部”、“反右倾”。如果对这两例案件作一番比较研究,最耐人寻味的是:面对有人对“大跃进”的“攻击”,一个小小教导处副主任作出的反应,竟然能与伟大领袖在一年后作出的反应英雄所见略同,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?作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亵渎毛泽东。“当蒙森写他的《罗马史》时,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史家并且以一种新的近代的语调说话

的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我要把那些古人从他们所居的虚幻的高台上拉到真实世界中来。这也就是执政官不得不变成一名镇长的原因。”(卡西尔《人论》上海译文 1986 版, P235)很明显,如果我们不敢于象蒙森那样作俯视性的观察,所谓研究就将存在坠入又一轮歌功颂德的危险。

肯定《少年犯》的这一贡献,就在于它能拓宽“庐山会议”研究的视野,让研究者的目光从“山上”扫描到“山下”。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,有点象读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和汪曾祺的《大淖纪事》;作家通过描写人物所处的环境来表现人物,研究者通过研究与会议相关的人和事来解释会议中的某些现象,这之中是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的。

二、对“鲁迅研究”的贡献。

近几年来,在学界对鲁迅提出质疑的很多。以谢泳的提问最为著名。他在《鲁迅研究之谜》一文中问道: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,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,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发生,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?”“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为什么不学好呢?”(见《胡适还是鲁迅》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年版, P19-20)谢泳是青年一代的学人,少年常振威进监狱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。应该说,他对“文革”前十七年学校的情况是知之不多的。在《少年犯》中,可以找到“这一切是从何而来”的答案。在弄清楚了“从何而来”之后,“读鲁迅的书”与“不学好”之间的因果关系便纯属子虚乌有了。

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中,权力的触角是无所不在的。1958 年,冯梦龙笔下那位扛桌子的人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替身(并不一定都是要报复仇人),不是一个,而是一群。少年常振威与同学闲聊中的一句话,先是被几个与他同龄的孩子演绎成要刺杀毛泽东,然后是为为人师表的老师煞有介事地向派出所报了案,派出所是闻风而动,立即拿下了这位“刺客”,并于当天关进了看守所。这一切是那样富有戏剧性。这些孩子也读过鲁迅的书吗?俗话说:“说的风吹过”。然而在类似《1984》新描绘的环境中是吹不掉的,因为“咳嗽也会有人录音”(此为胡风语,见于毛泽东亲自点评的《材料》)。最令人不能释怀的是,在《少年犯》中,从事这种“录音”工作的居然是几个孩子。“狂人”的话于是萦绕耳际:“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!”(鲁迅《狂人日记》)这“娘老子”就是整个社会,其中包括谢泳所说的那些被学生打死的老师。

说它富有戏剧性一点也不冤枉。其一,当年报道毛泽东的行踪,出于安全考虑,都是事后的“回忆”,在“第一时间”的报道是没有的。等到孩子们议论时,它已成了“历史”。其二,毛泽东乘“江峡”(“文革”中更名为“东方红”)轮抵沙市时,只是召见了当地地委和市委的两个书记,并没有登岸。(《少年犯》说法有误。但它反映了当年的真实,孩子们出于崇敬和“引为骄傲”,是期盼他上岸的,这样他就“登岸”了。)这颇有点象鲁迅《铸剑》中的一个细节:因为出现了“眉间尺”,楚王改道了。出于安全的考虑,毛泽东也没有离开“江峡”轮。

由于这只是一出“戏”,少年常振威获得“宽大”的机会是始终存在的。苦于《1984》这样的“场”中,扛桌子的人络绎不绝,少年常振威在1958、6、24入狱之后,又与另一位扛桌子的人遭遇了。这位扛桌子的人,就是书中提到的那位团干,此时是教导处副主任的关某某。

在关副主任的主持下,在揭批纪友武的过程中,“山下”的孩子们和一年后“山上”的大人们用的是同一个“脚本”。孩子们挖出了一个“反革命集团”,大人们挖出了一个“军事俱乐部”。其中少年常振威已因故离开这所学校一年(另一位被网罗进去的少年黄清川,也是早已离开了该校),只因为1956年进入该校时,曾与纪友武等几位同学经常在课余做一种名叫“打游击”的游戏,顽皮的孩子们在游戏之中相互又取了一些浑名;又因为少年常振威的浑名是“总统”,而“打游击”被定性为“军事训练”,浑名被定性为“反动职务”,甚至将他们学装的矿石收音机诬指为是与台湾联系的“电台”,就这样,当年不满十七岁的少年常振威就成了这个“反革命集团”的首犯。如此这般,一千又三十年前的那一幕在1958年又重新上演!我们不能说历史没有进步,因为这一群罹难的孩子并没有被“立即斩首”。

我们现在说起这些事情来难免不觉得有些滑稽,不是当事人就不会知道其中之苦。这些孩子先是进监狱,其中还有过戴脚镣手铐的经历,后来又送“劳教”,这一切都是在“暗箱”中操作,从未对其中的任何在押者宣告过“罪名”。而“未庄”的舆论向来是“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,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?”(鲁迅《阿Q正传》)“被送‘劳教’就是他坏的证据,不坏又何至于送‘劳教’呢?”这,决定了他们今后一生的人生轨迹。

不论是这些不幸的孩子,还是那些“立场坚定”、“爱憎分明”的孩子,

甚至包括那位关某某(当年他也只是刚刚从中师毕业不久的一名学生),他们都是陷入这个“场”中的受害者,在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指挥下,分别扮演了甲乙丙丁的角色。这就是当年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。林贤治在与谢泳辩驳时,曾提及“教育的力量”,而教育的力量会有如此之巨,由于年龄的原因,怕也不是他所能想到的罢。

这与读鲁迅的书有什么关系呢?

作为当年的初中生,这群孩子读鲁迅,至多也不过是收入课本中的《故乡》、《社戏》、《一件小事》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;至于那位教导处副主任,他大概会比他的学生多几篇收入中师课本的课文,再加上曾经作为“学习材料”印发过的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。孩子们的行为和这位副主任的行为,是鲁迅教的吗?

揭批一个人而能挖出一个集团,乃是古已有之。这就是鲁迅在杂文中提到过的“瓜蔓抄”。这种做法早已渗入历史的“基因”,而为一代又一代的权力者所承袭。最著名的例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批胡风,批着批着,一个集团便出来了。案发前,有很多“成员”甚至未曾谋面。女作家苏青只因写剧本《司马迁》曾致信向贾植芳求教,当贾植芳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之后,因为这封信,她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了一年半。1957年“反右”之中,“瓜蔓抄”的普及程度则更高。而关某某早在“反右”之前就崭露头角。所以说,他能如法炮制出一个“集团”应归功于运动对他的“教育”和“培养”。

至于此后学校的情况会怎样,在《少年犯》中是找不到了。但有一点可以代替别的千言万语,就是关某在经历了一茬又一茬运动之后,终于被培养成为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所高等院校的校长。

如果谢泳和林贤治都能看到这本回忆录,争论起来可以省去很多话。把“文革”和鲁迅相提并论是有失偏颇的。这是一个大题目。为一本回忆录所写的序不能离题太远,也只好就此打住。归纳为一句话,谢泳提到的那些现象,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用鲁迅的话说,这叫做“治绩”。“文革”中那些血淋淋的场面,说到底,是五千年“治绩”与十七年“治绩”的交相辉映。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与此毫不相干。

三、对“文革”研究的贡献。

当我在《少年犯》中寻找谢泳提问的答案时,实际上是同时又进入了

另一个研究领域——“文革”研究。少年常振威从1958年6月24日入狱到1979年9月拿到第二份经过修改的“复议结论”(日期为1979年8月1日),他的炼狱生涯长达21年,而“文革”十年又占了其中的一半,他对这十年的记录为研究“文革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尽管有关“文革”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不少,如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、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、季羨林的《牛棚杂忆》等等,吴德的《风雨十年》、陶铸夫人《曾志回忆录》等等;前者为作家和学者的文字,后者为中共党政要人的口述,均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;但象常振威《少年犯》这样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记录,可以说是罕如凤毛麟角。在上述的回忆录中,我们难得见到市井百态。而最底层这一块是“十年浩劫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当年毛泽东在肯定“形势大好”时有一句话:“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。”所以离开“市井百态”而谈“文革”是片面的,而且也很难见到称其为“大革命”的“大”的普及程度。在毛泽东的政治学中对基层的关注贯彻始终,如果没有这种关注,他也就不会那么频繁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“运动”;“文革”中有“最新最高指示”说:“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”,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。”黄仁宇先生说:“毛泽东翻转社会上的低层机构。”(《放宽历史的视界》中国社科1998年版,P413)这是十分有见地的论断。

欲观“文革”在最底层,请读《少年犯》。

在社会最底层,具有常振威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少,而类似《少年犯》这样的记录为什么难得一见呢?因为能写出这样的记录,除经历之外,还必须兼具一定的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以及敢于笔录的胆识。作者在赠阅本的《后记》中说:“当年,我一踏进监狱的大门,即萌生了要记下这段历史的想法。”加之他得益于家学渊源,自幼喜好文史,致使他能集此三者于一身。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,却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得天独厚。他的叙述朴实无华,平铺直叙,可以称得上是他所在单位及他本人的一部“文革”编年史。

以往的“教科书”有这样两句话: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。”“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承担者。”(因久不看教科书,不知现在是如何说法。)这第一句肯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,但翻开历史一查,尽是大人物在创造,此说未免捉襟见肘;这样才有了第二句话,意思是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,而社会的物质财富是由人民创造的,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了

第一句的判断。看了《少年犯》，我才知道人民群众还真的是历史的创造者。不过它的内涵与“教科书”的不相同。我们以往只看到大人物们创造历史，却从来没有考虑大人物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；原来“大人物”是由大人物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，然后“大人物”再去创造历史（其中包括把芸芸众生创造成“革命群众”），所以归根结底历史还是人民创造的。毛泽东说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。”

谁能看到具体的“人民”呢？

诗人杨克在一首题为《人民》的诗中写道：那些讨薪的农民工/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148双残损的手掌/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/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/沾了口水数钱的长舌妇/发廊妹/不合法的性工作者/跟城管打游击的小贩/需要桑那的小老板/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/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/单位里头的丑角和配角。（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《2005文学中国》）这就是当下的具体的“人民”。三四十年前，“文革”中的“人民”是什么样子呢？《少年犯》为我们做了忠实的记录。

这里有随意带人抄家的一字不识的居民小组长，有打死“阶级敌人”罗传凤的红卫兵，有被武斗流弹击毙的纺织女工，有无缘无故敢于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陈石匠，有为了自己的隐情而向“阶级敌人”通风报信的支部委员张良科，有为泄私愤而“扛桌子”陷害他人的中共党员肖邦其，有为了站稳立场而临场发挥的刘炳文，有为了节省一元多钱车费半夜启程徒步百里回家度周末的黄发生，有在大筛架上写“五字反标”的小男孩，有与丈母娘乱伦的刘某，有问顾客是什么成分的剃头佬，有“阶级斗争”的弦绷得过紧反应失常的陈保华，有在诊所内大声提醒病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陈护士，有把“四届人大”理解成“世界人大”的复员军人王正位，有手画“进餐券”捉弄复员军人的陈代一，有在“忆苦思甜”大会上将“旧苦”与“新苦”混为一谈的农村老姨妈，有以整人为职业的基层小干部王指导、黎头、蓝书记……

此外，自然还有一时半会不能纳入“人民”之册，而必须纳入“另册”的，有怕挨打而下跪乞求的级别最低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王英，有“两劳人员”、再度被揪出来的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常振威，有因“特嫌”而被装在麻袋内惨遭毒打的“右派分子”赵永祥，有因儿时当过苦力而今升格为“汉奸”的龙兴云，有由县级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

变成“叛徒”的权乐采,有自称“中央特派员”而成功地捉弄了黎书记的邹传银,有用三角刮刀戳烂《毛主席语录》坦白交待后获得“宽大”的共青团员高崇宣,有在批斗会上当众解溲的卫某某(女),有自己给自己写大字报的陈荆安,有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后据说是“带着花岗岩的脑袋”而死的运动对象……

于此浑浑噩噩之中,“革命”是进行得那样轰轰烈烈。我们仅能找到些许微弱的亮点:张文德在大会上揭批常振威后于心不安,借着在厕所内相遇的机会,他说出了这样的大实话:“他们非要我发言,其实我也讲不出你有什么问题来,你千万别见怪呀!”还有一位被王指导相中,想动员他出来“作证”的王正位,背地里他也说出了大实话:“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想整你!我对他们说:‘我没有听到常振威说这话。’我就不相信你常振威这么精怪的人,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”这是在恐怖的高压之下残存的一点人性!我们今天大言讲“诚信”,而“不诚信”从何而来,总算在这里找到它的源头了!

在写这篇《序》之前,我是把《少年犯》仅仅当作史料来读的,为了写序,我又重读了几遍。真象汪曾祺在评论林斤澜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:“读到第四天,我好象有点明白了。而且也读出好来了。”通过仔细地阅读,我仿佛觉得是在读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,满目所见皆是贫穷和愚昧。作者在写回忆录时,于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《呼兰河传》的“文革”版。说是无意之中,是基于作者的写作条件。作者在写回忆录时,除单位退还给他的“交待材料”之外,没有任何文件资料可供参考。参考文件虽能激活记忆,而产生“望文生义”也实在是在所难免。作者全凭记忆为之,唯当年刻骨铭心之事,于今天才能历历在目。这样,写作条件的缺憾,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则是真实,真实到了原汁原味。这也是本书优于某些回忆录的一大特点。

从以上这些真人真事,我们可以看到,这些人(以整人为职业的几位小干部除外),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“历史发展的物质承担者”。他们修桥铺路,通过奉献体力和技能而谋取衣食。对于伟大领袖发动“文革”的真谛是不甚了了的,然而一旦被“发动”起来,作为“动力”也不会全然没有“创造”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“悲剧”和“喜剧”。“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,“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”。(鲁迅语)

在“文革”研究中,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:“文革”好像是法国大革命。读罢《少年犯》,一种滑稽之感不禁油然而生。“文革”从一开始就强调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!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,两百多年来,不知该有多少学者皓首穷经,却从未闻大革命是由某人发动和领导的!这种本质的不同,使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别于霄壤。

“文革”从本质上讲是造神运动的必然结果,如果没有历年的造神运动就不会有“文革”。《少年犯》中有一段忠实于历史的记录:“虽说社会上局面乱成一锅粥,但所有组织或个人,甚至连‘牛鬼蛇神’们,以及早就被定性的‘五类分子’,却没有一个人不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。”作者是被政治关心过的,此时的他于政治是十二分的敏感,他的这个观察是相当准确的。

当像章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时,作者也从照相师那里弄到自制的像章,佩戴起来。作者在自己的工具箱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了“毛主席语录”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。”又将毛泽东诗词悬挂在自己的工作台前。他所做的这一切,并不是来自于某种规定和指令。全社会都在这样做。今天说起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、“红海洋”,很多青年人都会不知所云,而当时这类政治广告的泛滥程度,定会教今天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望尘莫及。作者不自觉地参与其中,应该是敬畏多于崇拜。当年有不少人是基于这样的心理。

作者所在单位,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单位,而出现有关毛泽东的“政治案件”就达三起之多。先是中共党员、复员军人肖邦其诬陷作者出言不逊,侮辱像章;其二,大筛架上出现“五字反标”;其三,有人用三角刮刀戳烂红宝书《毛主席语录》。如果不是造神,这三起“案件”就不可能存在。特别是第二起“案件”,“作案者”居然是个刚刚上小学的儿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?他也与政治有关吗?儿童心理学家是会重视这个案例的。当年在这位小孩的眼里,处处看到的是“打倒某某”;于是他一半是模仿,一半是标新立异,用粉笔写下了这条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标语。这符合儿童的猎奇心理。而在正常的情况下,象他这样的年龄,他应该是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林童话》、《三毛流浪记》的读者。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了。所幸的是,王指导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够漂亮,没有无限上纲,只是就事论事;这也是因为姚司机的成份好,又是王指导的老部下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当年即有家长因此被判刑的例子。看来也不会记入姚司机的档案。如果记了,谚云:“一字入档案,九牛拉不出。”等这个孩子长大了,他要想参军、入党、提干、升学,那就不是一般地麻烦了。

作者在“一打三反”的“大学习班”内,曾为赵洪运虚惊一场。原来是他那才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家中闯了祸:说是几个大孩子在一起看小人书,书上画有毛主席和刘少奇,爱憎分明的孩子们,都指着刘少奇说这个是坏人,站在一旁的他也跟着大孩子去指,他人小手短,哪能指得到位呢?恰好指到了毛主席,说这是坏的。这下还了得!这群觉悟特高的小学生不依不饶。他们七手八脚、边推边嚷地将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押到了居委会……于是就出现了民警将赵洪运从大学习班带走的那一幕。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,1958年与常振威纠缠不清的是几个与他同龄的中学生,此时经过“文革”的革命洗礼,“扛桌子”告发一个幼儿的却是几个小学生了。“扛桌子”的人正在日益低龄化。如果不是因毛泽东于1976年死亡,“文革”戛然而止,下一步将在幼儿中出现“扛桌子”的人实在是势所必然。“文革”中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。报纸上的提法是:“从小粗知马列主义。”

这一切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。没有这个前提,神是造不出来的。英国史学家柏雷说过:“希腊人的外国知识,对于他们怀疑权威的态度大有影响。”(《思想自由史》罗家伦译岳麓书社1988)即使是为了节省一元多钱车费,半夜启程徒步百里回家度周末的黄发生,他也一定牢记着:“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。”相反,法国大革命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去进行的。当年法国先贤们探讨的问题,比如:义务教育、教育的世俗化、废止死刑等等(见《孔多塞传》),为“文革”时的中国人闻所未闻。在我国产的革命中,只有辛亥革命因性质相同有资格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较,“文革”与法国大革命的“貌合神离”是一清二楚的。如果“等量代换”可以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话,我们不妨来一句:“文革”好像是辛亥革命,则如此比附的不当便洞若观火了。

这里,依然是细节的力量。

历史的“基因”便蕴藏在大量的细节之中。《少年犯》以忠实地记录历史见长,它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意义,就在于它储存了大量的细节,必将为认识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有心人所看重、利用、传播,从而彰显它历久弥新